



文明、“超社会体系”与中国

[文章编号] 1001-5558 (2012) 04-0126-06

●王铭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E

一些年前,在国际政治学里面,出现了“文明冲突论”这一说法^①,引起国际政治学界热烈的讨论。“文明冲突论”本与“跨文明互动”这一课题有直接的关系,而因为它是国际政治学界提出的,所以民族学界讨论得比较少。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政治学家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此前的国际政治研究,所考虑的都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亨廷顿在他的著作里则把国际政治学的问题看成文化问题 (他重申文明是文化实体)。此前学者研究国家间关系问题,多数是在政治经济领域里面展开的,而亨廷顿的著作则把 21 世纪可能出现的世界新格局和新矛盾的动向跟文明格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亨氏所说的“文明”是超越政治实体的宗教—哲学地区性体系。他罗列了一些我们很熟知的一些体系,除了中华和日本之外,其他大“文明”都是宗教性的,像基督教的体系、伊斯兰、印度,而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它们则是本土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结合或部落认同与统一的非洲认同的结合。^②他认为未来的世界的冲突会来源于文明的差异。亨廷顿的主张提出来后,在国内

* 本文是根据笔者在“跨文明互动:区域研究的视野”学术研讨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该会议于 2012 年 6 月在西宁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行。感谢马成俊教授的邀请及张海云教授在笔者整理此文给予的重要帮助。

① 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② 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3~32.

西北民族研究

N.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2 年第 4 期(总第 75 期)

2012.No.4(Total No.75)



外政治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应。国内的政治学家更多是试图采用更中庸的、非冲突性的解释框架来看国际关系,但因他们多数并未将政治与文化相结合,故所作努力并不成功。^①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晚年思想集中于文化思考,^②他提出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可谓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提出来的重要主张。

未来文明间到底是会冲突还是会和谐?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我自己的思考来自一个细部。

亨廷顿在谈到东亚的这个板块的时候,用“中华”(Sinitic)来替代此前流行的“儒家”,且说,“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③与许多学者一样,亨廷顿没有把“中华”看成铁板一块,但仔细考究,他基本上还是把“中华”这个文明板块形容成以儒家为主导的体系,且隐约预期这个文明体系在未来会成为基督教对手之一。

到底“中华”未来是否会成为基督教对手?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已经预设了文明差异是文明冲突的根由。我不想这么预设,而只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华”这个文明板块不仅有儒家,那么,其他内涵是什么?这些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文明中如何相处?

未被我们充分予以理解、阐释的一个“平凡现象”是,除了亨廷顿所讲的作为文明实体的“中华”之外,他所列举的诸种宗教—哲学体系在中国的政治地理内部竟都是并存的。

中国自身是文明各方的汇合地,这个板块上,不仅有“儒教”及其他“世界宗教”,还有诸如中南美洲的“土洋结合”、非洲的“分裂与统一”之类的现象。

迄今,能充分诠释“中华”的内在“混杂性”的理论仍告阙如。

文明互动虽然像亨廷顿说的主要是国际政治学的问题,但是它也时常会表现为国家内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倒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亨廷顿所讲的文明体系之差异与区分,存在于“中华”内部。那么,它们之间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互动模式到底是不是冲突性的?

诸如此类问题有待我们研究。

中国的多文明互动,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点。

以前的研究,大概是分成两种。一种是把中国看成以不同地区为基础构成的“帝国”,这一说在解放前中国文史界及后来的欧美汉学界已广泛存在,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中心来叙述整体文明的历史。第二种,则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说是在清末开始的。在国内,从梁启超开始,就一面主张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一面主张认识民族多元融合的本质特征。国外也有不少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者关注中国的“周边问题”,与汉族中心的中国观不同,诸如日本的鸟居龙藏之类,主要是绕着中国周边在转。民国期间,国内民族学的南派,将历史上的夷夏之辨现代化,而社会学的北派则更务实地坚持多元一体之论。在抗战期间,关于“多”与“一”,傅斯年、顾颉刚这一阵营曾与吴文藻、费孝通这一阵营之间发生过比较激烈的辩论。学术史上,固然可以分成倾向于多元者与倾向于一体者,但国内学者共同把中

① 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③ 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9。

国形形成由不同民族融合互动的地块。^①

海内外中国研究,有的侧重区域理论,有的侧重民族理论,借助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分别将中国形容成区域多元与民族多元的国度。

对于前人的研究,我们所能作的补充,是指出中国除了区域多元和民族多元之外,还有宗教—哲学的多元。

这一点,我认为此前的中国研究无论民族学、民族史研究还是人类学、社会学,关注得都不充分。

那么,中国的宗教和文明多元,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大概的一个看法是:中国是由原生性宗教和欧亚大陆的三大“创生性”宗教板块互动、构成的“文明体”。^②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所谓原生性宗教指的就是跟制度化宗教(这些宗教有传教组织、祭祀机构、经文等)不同的宗教,其在人类学界被更广泛接受的称呼叫“原始宗教”,所谓“创生性宗教”是在原生性宗教基础上由宗教家哲学化、宇宙论化或信仰化的。^③自产生以来,创生性宗教便有别于其“原始根基”,甚至对之有压抑作用。在欧亚大陆上,大的宗教板块上有三个:闪米特—伊斯兰、印—欧、东亚。这三个亚传统之间的差异是有待我们研究的。过去的学者更重视对于宗教教条的内容及强制性程度之差异的比较,而我自己受社会科学思想的影响,更强调对于不同宗教的仪轨之差异的比较,而且我认为,此前的研究更重视祭祀理论,^④这是值得参考的。欧亚大陆的宗教差异可能更集中表现于不同宗教对于祭品的规定上。在东亚这个板块和闪米特这个板块上长期保留着动物的献祭。而在基督教,就是印欧文明很早就出现了献祭个别作为替罪羊的人,以此来替代动物献祭。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中国佛教这一板块,更早地出现了对动物祭祀的禁止。

以上说的这三个板块是欧亚大陆的三个亚传统,都并存于中国。涉及于此,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民族与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以前我们可能有过一种误会,以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固然可以说,每个民族都有原生性宗教,我们也务必承认,所谓原生性宗教恰是人类普遍的。从民族志调查可以发现,不同民族的宗教,正是由人类普遍的“原生性宗教”与后来的宗教“大传统”之间互动、叠加而成。这也就是说,所有民族的宗教都是混合性的。事实果然如此?等待论证。其二,所谓的区域,亦是如此。自20世纪初起,即有学者把中国划成几个大区域,将各区域描述成接近于“社会”的东西,认为其内部有严格意义上的“整合”,而我在不反对“区域社会论”的前提下还想指出,区域内部,宗教文明也都是多元的,因之,所谓“社会”与“文化”两相对应。举我比较熟悉的泉州为例,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摩尼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等,在那里并存了许多

① 关于这些叙述,可参见王铭铭主编、杨清媚、张亚辉副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② 关于“文明体”,见王铭铭:《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J],《文化纵横》,2008,(12)。

③ 关于原生性与创生性宗教的定义,见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④ W. Robertson Smith,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meridian Library, 1957.

世纪。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的区域，也是由其原生性宗教与创生性宗教互动、叠加而成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似乎便可以认为，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是由宗教多元的民族与区域构成的，或者倒过来说，每个区域，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更大的文明互动场景的“缩影”。

我提出用“超社会体系”概念来理解中国。^①提出这个概念是想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并不单一的社会，一个“超社会的社会”。社会学有“中国社会”概念，但这个概念无法概括包容“区域社会”与“民族社会”，不反映中国区域与民族的多元性。

前面我借对学术史的极其粗略的概括谈到，中国民族多元、区域多元，且单个民族、单个区域内部也多元。中国作为整体，应该说是把这几种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的“大一统”（有汉族的大一统，也有诸如蒙古、满的大一统），都想把多样性“结合”起来。到底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将欧亚大陆东部板块融为一体的机制？这一机制又是什么？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暂时把中国称作一个“超社会体系”，其意思当然是，当这一体系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时，它才是真正的“整体”。若非如此，则可能不是。而事实可能是，近代之前的中国，长期摇摆于整体与非整体之间，且其政治理想并非是整体主义，而是在整体主义与非整体主义之间。

民族学学科，不是哲学和政治学，我们更经验。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应更经验地研究。我主张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探讨“超社会的社会”之存在方式与结合程度。

在宏观方面，互动可能超过前面我们所提的超社会体系的范畴，成为亨廷顿所说的各种大的文明板块互动的复杂局面，包括那一让人担忧的冲突状态。宏观研究应该考虑：多种大宗教文明体系之间在政治上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主次如何，是否可以说儒家自从汉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整体的核心施政纲领和意识形态？在某些阶段是否出现过以非儒家的宗教为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状况？具体而言，是否出现过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阶段？基督宗教显然从来没有在中国成为“国教”，明朝曾让利玛窦来帮皇帝“看天”算命，但天主教不被接受为意识形态。会存在一些阶段，道教、佛教、藏传佛教成为替代儒教的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道教、汉传佛教之成为“国教”，存在阶段似乎不是整个朝代，而局限于个别皇帝统治的阶段，而藏传佛教之成为“国教”，则与“长城以外”的草原势力相关……对于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应作更具体的研究。

从中观上看，我们应该在区域的范围里（这个区域指的是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宏观区域，而不是指小地方）研究文明互动方式，民族学界尚待加以充分概括。要研究这些互动，显然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论纲领。有哪些东西构成这一“纲领”？原则还是区域研究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内涵有待细分。我认为，对跨文明互动作中观研究，首先应该注重考察技术、知识和神话，研究它们的传播、转化、变形的过程。技术并没有带着宗教—哲学的含义和价值判断，因之经常会被更广泛的领域所接受。知识也不是教条，跟技术一样，会传播得比较快。同样的，神话也属于这一类。神话传说里很多汉族的故事会传到别的民族，变成另一种故事，别的民族的故事会传到汉族，变成另外一些故事。在区域的范围里面，像在西北区域或西南区

^① 王铭铭：《超社会体系——对文明人类学的初步探讨》[J]，《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15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再谈“超社会体系”[J]，《西北民族研究》，2011，（3）。

域,这些传播和变型的规律是什么?其二,跨文明互动主要还通过贸易和通婚。各文明之间虽然有宗教的差异、哲学的差异、信仰的差异、价值的差异,但是贸易和通婚是人们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历史上很多时候跟今天一样,是实行跨族通婚的,贸易更是非常明显的。人们以前有一个误会,认为中国的民族地区都是一些封闭的社会,这些社会等待着汉族来开发,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历史事实表明,正是在这些我们误以为是封闭的地方,贸易和通婚最开放。贸易、物品和配偶的流动是怎么样的?钱是怎么样被使用的?这些都有待我们去给予更多的“注释”。其三,我觉得跨文明互动还要有一个旅行史的角度。旅行是一种文明互动的重要方式,学术史上有很多人研究旅行家,在民族学里面可能对这点也有研究。旅行很重要,从这个族走到另外一个族的精英、战士、传教的人、商人,其行走轨迹如何?他们如何看待“异国”?我想各伟大的文明之所以是文明,之所以是宗教和哲学的“大传统”,是因为有旅行家。所谓“轴心文明”的缔造者都是孤苦伶仃的旅行者、漂泊者。民族学有待对这群人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也留下了各种文字的记载。其四,关于战争、竞争和冲突,我们也要给予更多关注。各大文明之间无论是在世界这个领域还是在国家这个领域里面,战争和利益的冲突这些竞赛(包括现在的体育竞赛),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最后我认为是宗教的互动。传教,拒绝被传教,或者说最典型的例子是中西礼仪之争,像这些例子,都值得研究。总的来说,我想表明,从互动的各种方式,从中观这个层次,我们看到的,冲突不是唯一的,应该倒过来说,冲突是文明互动的一种方式而已。

从微观上说,我们也有待推进文明互动的研究,以丰富、修正传统人类学对大小传统的区分,使之适用于互动频繁地区之研究。大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将社区定义为小传统,将社区之外的有组织化的教会机构定义为大传统,之后引起不少争议。后世学者的研究表明,所谓大小传统,其差异实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宗教有关,我们不能像雷德菲尔德那样,将“文明”或“大传统”定义为基督宗教所代表的现代性。后世的这一补充意味深长,但并不表明雷氏的假设全无参考价值。重读雷氏之作可以发现,其所谓“小传统”实际是指从根本上比个体主义化的现代文明更加能够融合不同文明因素的“民间文化”。也就是说,所谓现代性(或者雷氏简单化地称作“文明”的东西),乃是观念与生活更加分化的社会形态,而传统“民间文化”,则在组织得更为紧密的道德秩序下容纳了不同的“性格”。^①换句话说,雷氏的本意或许是指出,在通常的民族志场景(特别是乡民社区)中,不同文明形成密切关系,在被研究的“生活世界”融为一体。后人在批评雷氏时忘却了他的这一论断,更未将之贯彻于民族志研究中,这就将“生活世界”中的跨文明关系研究留给我们了。

以上,我从政治学的文明冲突论,联想到国内民族与地区的多元论及宗教—哲学多元论。基于这一联想,我重申了“超社会体系”概念对于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接着,我提出了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作跨文明互动研究的思路。

我考虑的主要是“国内”的跨文明互动,但我宁愿给“国内”带上引号,这是因为考虑到文明互动自身是超出了国家范畴的。这一悖论也是“国族主义社会科学”困境之来源。即使我们局限于“国家民族学”,以国为单位展开研究,我们依然需要关注“内部他者”。如何对待“内部

^① Robert Redfield,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他者”，内部的其他人，其他文明？我愿意相信，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是一种文明互动方式，跟技术、知识、神话、旅行、贸易、通婚、祭祀、宗教、战争一样，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人类学家尤其像旅行家，他们通过穿行于文明之间来得到认识，得到跟另一个文明接触的机会。人类学研究的原则是我们要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当中，起码暂时采用他们的价值观，以他们的宇宙论为我们建构理论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国家民族学”里本也很重要，却长期被淡忘。我们如何对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参与观察与尊重他者依然成为常识，但吊诡的是，这在国内民族学界和人类学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过去的几十年，由于我们的民族学多数是政策民族学而不是理解民族学，所以未能成为文明交往的方法。我要重申，一个好的民族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之所以“好”，是因为善于向他人学习，向被研究者学习。倘若我们实现了这一“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民族学或人类学是跨文明互动的一种好方式。

[收稿日期] 2012-10-03

[作者简介]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电邮：anthwmm@sina.com。北京 100871

The Transformation of Zagu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and Regional Market Sprout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Tian

Abstract: Located between Chengtu Plain and Qinghai-Tibet Plateau, Za Gunao Valley equips with inter-ethnic groups trade.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market system did not appear in this region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at period, native chieftain made strategically use of the tribute system, and obtained quite a lot of benefits from Tea-Horse Trade/Market. In 1752, the 17th year of Qian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o native station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new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hanges of Tibetan House-name System, the regional market sprouted.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Zagu chieftain transformation of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market sprout (See p.168)

The Ethical Mentality of Northwestern Minorities in Daily Contacts

Ma Zhijun Kang Chunying

Abstract: The ethical mentality of northwestern minorities in daily contacts refers to a responsive way shaped by morality including the polite attitude, emotions, rituals of mind, will and mind. Thi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a kind of morality centered on goodness which showed the religious believes and ethical requirements of northwestern minorities and their value of insisting on the primacy of the moral principle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ethical mentality; daily contacts; morality (See p.193)